

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

韦 凤 娟



1906年5月16日，江苏省松江县的参府衙门内宅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声。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文学史家——余冠英先生。

这时他的父亲正担任江南省提标中军参将，虽然本人由于身遭离乱，读书未果而投军习武，却极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他的母亲聪慧过人，尽管没有投师学艺，却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学会调弄丹青，一虫一鸟，一草一木，颇有意趣。这样的母亲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好学。这个家庭里曾有两个女孩，未能养大，所以这个男孩的诞生就格外使做父母的感到欣慰。父母的厚望从给孩子取的名字中便可以看出：“冠英”，群英之冠，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一片心意。而孩子的小名“松寿”，则是对孩子健康长寿的祝福。

时间过得很快，他三岁了。母亲开始教他认字。用的是最普通的方法：把硬纸裁成方块，写上毛笔字，一块一字。起初，一天认四字，后来增加到八字，最后又增加到十六字。小孩子总是要人哄的。为了提高小孩的学习兴趣，慈爱的母亲采用了“物质

奖励”的办法：每认识四个生字，奖励水果糖一块。这样，每天认十六字，便可得到四块糖了。有一回，母亲想测验一下他的接受能力，又增加了四个字。他毫不吃力地认得了。这本来是一件高兴事，结局却是不愉快的。原来，这个孩子提出再加一块水果糖，因为“多认了四个字”。母亲以“牙已坏了，不能再多吃糖”为理由，拒绝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他又吵又闹，不肯罢休，于是被母亲打了屁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挨打，在孩童的心中以为是奇耻大辱，印象极其深刻。

由于家中只有这一个孩童，他备受宠爱，进出都有大人相随，还常常被父亲带着应酬客人。等到会背唐诗了，更经常被大人唤到厅堂上，当着宾客“表演”。大概是经了“世面”，所以他比同龄的孩子显得稳重得多，懂事得多。然而，孩子的天性总是活泼的、好动的，整天在成人圈里，这个敏感的孩童也感到了一丝孤独。他没有玩伴，便爱上了动物。他最喜欢的是家里养的一只大黑猫，猫长得很肥壮，浑身的毛油亮亮的。它能从屋檐猛然跳下，腾空捕捉在荷花缸饮饱水飞起来的麻雀。再就是一匹西口大青骡，它又高又壮，很有气派，而且性格驯良。大约动物和孩童的心意是最容易沟通的。这个四岁的孩子，个子还没有骡腿高，胆子却大得出奇，一见大青骡就非要骑上不可。马夫把他抱上去，大青骡不急不躁，稳稳当当地走起来了。他神气地拉着缰绳，左顾右盼，引得满街的人都延颈而望，真是开心极了。从此，他和大青骡交了朋友，几乎每天都要骑一回。从参府衙门向东走，有一个关帝庙，庙里的老和尚是他父亲的朋友，他便经常骑骡子到庙里玩。有时到庙门前就转回。起初还有马夫跟着，抱上抱下，后来，走熟了，骡子认得路，于是马夫也就懒得跟了，每次把小孩往骡背上一抱，便在马房前等着骡子把人驮回来。有一次，骡子从关帝庙回来，却不见有人来接孩子。骡子大概有点不耐烦了，便驮着人进了大门，进了大堂、二堂，又拐弯，到了花厅之上。

它看见花厅上的高脚架上摆着一盆金桔，便不客气地张口去吃……，终于把花盆架拖倒打碎了花盆。人们跑过来，看见他仍然沉着地骑在骡背上，他的母亲不禁又惊又气。从此，他受到限制，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骑这匹青骡了。事实上，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机会亲近这种通人性的动物。直到解放后参加土改，一位县委书记将自己的枣红马让先生骑了一段路。许多同行的大学生惊讶地说：“您骑得不错啊。”这时，年近五十的余先生很自然地想起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那么多色彩和欢乐的伙伴——大青骡。

六岁后，全家迁居扬州。有一天，他正独自在家，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风度儒雅的老者，说：“你是松寿吧？”又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的陈伯父。”他很有礼貌地把客人邀到小客厅坐下，自己侍立一旁。一老一少便交谈起来。陈伯父见这个年仅七岁的少年举止得体，应答自如，大为称赞，过几日便托人致意，欲订下儿女婚约。父亲没有意见，母亲却认为陈家是大族，门第高，不太同意。正在商议之中，接到陈家的请帖，要他们父子前去做客。一到陈家，只见许多人拥出来看他，原来陈家是要相看这位少年郎。谈话间，从里面跑出一个穿花衣的小女孩，毫不拘束地叫他“小哥哥”，要他一起去玩。于是，陈家人“小姑爷”、“小姑爷”的叫开了，婚事也就定了下来。这位选中他做东床的陈翁，便是当地有名的耆旧陈巽卿。陈翁是一位清朝遗老，至死拖着长辫，不过张勋复辟请他做户部尚书，他却拒绝了。

到扬州不久，家里大人就送他上蒙馆。塾师的水平不高，教的书多，讲得却很少，书理的也很少。快过年了，家长要来看，他才开始认真为孩子理书，小孩子一下子理不熟，便打手心。此后家里不让他上蒙馆了，先后请过几位先生到家里来教。其中有一位叫李石钧的秀才，给冠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生一方面

教书，一方面还给一家《民声报馆》写时评。他教冠英读古文，出题目写文章，还时常叫他写时评。十来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时事，李先生便说个大意，让他来写，李先生改一遍，然后就登报。这时他也开始读白话小说，读得多了，也跃跃欲试，写了一篇滑稽小说，居然在报纸上连载了。这时他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在书斋中，他显得那么文静稳重；然而，一出书斋，就象撒欢的小马驹一样，恢复了孩子活泼的天性。他长得又高又瘦，象一颗豆芽菜，但打起架来却很能拚，有一回被比他高壮的一个孩子摔到泥水里了。他回到家里，父亲很恼怒，给他“约法三章”：第一，不再打架；第二，若要打，打赢了才许回来；第三，打不赢不许哭。

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不如过去了，但母亲仍然很重视他的教育，凡是孩子买书，她总是尽量满足。扬州城里有一个旧货店，也卖旧书，放在高阁上，他便登着木梯爬上去翻寻喜爱的书。还有两家书店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母亲给了他一个折子，凡是他在这两个书店买书，都可以先不付钱，而是记在折子上，到年底，母亲再拿着折子和书店对帐，一并交钱。

十三岁时考入高等小学。十六岁时，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后改名为扬州中学）。学校的功课对他来说轻松得很，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玩，成了学校里的“体育明星”，在一次运动会上参加了四个项目，跳远、跳高、110码低栏、百码短跑，都得了第一名。那时中学里没有适合的跑道，为了练习跑，他常常从城墙坍塌处登上城头，在城墙上快跑回家，差不多跑了半个城圈。中学期间，他的眼界开阔了，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革命思想，也和一些志趣相近的同学交朋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扬州地区也兴起学生爱国运动，成立了扬州学生联合会，冠英先生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工作中，组

织学生游行，并邀请进步人士来校讲演，共产党员恽代英就是其中之一。

1926年，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起初学历史，后转到中国文学系。在清华园中，他继续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当时盘踞在北京的北洋军阀奉系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实行血腥镇压，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并逮捕了大批进步学生，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得已，他于寒假时转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借读一学期。1927年，又转回清华。

当时的清华园中荟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他先后就教于杨树达、陈寅恪、黄节、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五十多年的光阴流逝了，但他对当年各位先生讲课的情景还记得清晰。他说：“陈先生最博，但记他的笔记极难，因为他中气不足，每一句话只能听清前半句；朱先生最用功，最认真，教古今诗选，每堂课都讲得满头大汗；黄节先生讲阮嗣宗诗和汉魏乐府中的‘风’诗……，他鼓励青年作诗给他看，批改很细。”除了听课，他“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较多。在大学期间，他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致力于新诗创作。四年级时，曾组织“唧唧诗社”，社友有曹葆华、郝御风等。每成一诗，社友们相互传看，品评一番，自得其乐。这时期创作的诗歌及散文曾有多篇发表于《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有时用“灌婴”这个笔名。

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他常对后辈谈及当年清华园中师友相得的情景和一些趣事。他说，当年的清华大学要求“文武双修”，不仅要学好本学科，而且对体育成绩也有严格要求，符合标准才能毕业。体育课中有游泳一项，他虽来自多水的南方，却不会游泳，著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逼着他学。每逢训练，马教授必手执长竹竿站在游泳池边，看大家把头埋在水里练憋气，谁不到时间就想抬头，那根竹竿就捅过来了……。

冠英先生风趣地说：“多亏那根竹竿，要不还可能拿不到那张文凭哩”。

1931年夏，本科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新诗》。这一年秋，留校担任助教。“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清华大学内迁到昆明。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他任联大师范学院讲师。1940年提升为副教授，后转为文学院教授。自1940年9月起，在教学之余，还担任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主编历五年之久。该刊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在该刊上经常撰稿者除他外，尚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王力、沈从文、游国恩、李广田、陈梦家、肖涤非、李嘉言、张清常等，在大后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与此同时，他对新文艺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曾为曹禺的《北京人》和《原野》两个剧本写过评论。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当地的报刊。在昆明期间，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及形势的发展，曾参加楚图南、闻一多等发起的十二教授签名运动，声援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西南联大的教师生活艰苦，而教学和研究都很勤劳。校中学术空气浓厚，常常有演讲会，曾有过三位楚辞专家同一天在三个教室讲屈原，各抒己见，颇有争鸣精神。

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回北平，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清华大学的广大进步师生也多次展开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活动。他积极参加到这些活动中，曾与朱自清、吴晗等一起签名，发表声明拒绝领美国“救济粮”。人民解放军逼近平津时，在国民党当局主使下，清华大学有南迁之议，教授会连日开会，意见分歧，辩论激烈，他坚决反对南迁。

解放后，冠英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关心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冬，曾到中南地区参加土改，历时四个月。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文理科各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他即转入当时归北京大学领导的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仍任原职。1979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建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改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1985年退居第二线，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冠英先生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1956年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成员参加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

余冠英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这两个时代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基于对诗歌史的精湛认识，他多年来致力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他高度评价汉魏六朝乐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就诗的精神而言，《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但是，“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里巷歌谣也是发展进步的。”他论述了乐府诗在形式上、题材上、艺术手法上的发展，以及对建安文学的巨大影响，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里巷歌谣影响文人制作并不止这一回，但是在内容上发生这么大的作用的例子还找不出第二个来，单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他的《乐府诗选》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编选的。

由于对乐府诗的关注，他还对汉魏以来的诗人及其创作、汉魏六朝的诗歌发展史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曾撰写《论蔡琰之悲愤诗》，博征史料，考查了蔡琰被虏的事实，断定五言《悲愤诗》

是蔡琰所作。在《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文中，他全面地论述了曹植的文学成就，指出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诗、骚、赋、颂——的修养，这对于他提炼诗的语言有所帮助。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不是把诗骚赋颂移植到诗里来。所以他发展了乐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这些论述对于理解曹植乃至建安文学的传统都很有价值。在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中，先生极其重视清新质朴的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这一观点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接受，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建安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七言诗体起源这一问题上，他也很重视民歌民谣的影响。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中，对七言诗是由楚辞系的诗歌蜕变而成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从大量文学史料中钩辑七言诗发展的蛛丝马迹，阐明七言诗体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七言诗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七言歌谣里找到根源。这一论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上面提及的几篇论文都收集在《汉魏六朝诗论丛》（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上海古典文学社1956年新版）一书中。集中还收有六篇论文，或分析乐府诗的形式特征，或诠释词句。他诠释乐府的态度，既不穿凿附会，也不主观的“以意逆志”，而是从乐府诗的内在精神及其民歌特质出发，别求新解，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长期以来，他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从事古典诗歌的选注工作。他怀着要把“优秀的作品择要推荐给一般文学爱好者”的热忱，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具的眼力，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去芜存菁的选择鉴别工作。他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诗经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1979年再版时与《诗经选》合并）、《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等几部选本，行文简洁准确，通俗生动。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诗经》今译。为了使文

字古老的《诗经》能被一般读者理解，他对译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除了符合自己所理解的原诗的意思这一基本要求而外，还要求语言流畅可读，并且多少传达一些原诗的风味情调。”（《诗经选》附记）因此，我们看到的《诗经选》译文，不仅在意义上忠于原著，而且具有浓郁的现代民歌韵味，实在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此受到普遍的好评和欢迎。

这几个选本的选目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比如《诗经选》选录《诗经》作品九十篇，而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民谣则是着重选录的精华部分。《汉魏六朝诗选》选录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间的诗歌约三百篇，既反映了编者一贯重视民间歌谣的态度，同时也不忽略对各时期代表性诗人的介绍，其取舍是严肃的、科学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概况。

《三曹诗选》选录了建安诗歌的代表作者曹氏父子的作品八十三首，几乎包罗了今存三曹所有重要的诗篇。由于这几部选本具有选目精萃、注释稳妥，深入浅出的特点，因此成了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的喜读之书。

这几部选本不仅以其通俗浅近使一般古典诗歌爱好者受益，而且以其学术性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先生的选本注释，一方面广采前人成果，对前人旧说作了科学的整理吸收，显示出深厚的功力；一方面又在篇义解说和词句注释上有许多精辟的创见。比如说长期以来《诗经》不少篇章的本义被严重的歪曲，乐府民歌的面貌也多有解释失真之处。他在选本的解说中提出了很多切实的见解，使相当一部分问题得到澄清。至于在词句注释上的创新之见，在这几部选本中是很多的。此外，这几部选本的校勘工夫也很值得称道。有人评论《乐府诗选》说：“总说诗意及介绍本事、背景之文，态度比较客观，大抵经过审慎之考订，故立论多中肯而无主观臆测之病。乐府古辞时有拼凑割裂处，本书一一指出，不作牵强附会之解释，也是一大优点。”直到目前，象这

样学术性很强的选本仍不多见。

余冠英先生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有关《诗经》、乐府诗、六朝诗歌的论文中，他都以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为背景来探讨有关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很有深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不免会出现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现象。比如，在《诗经》篇义的解说上，有人就把阶级分析法当成标签，任意贴用。而他却坚持立足于作家作品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去处理作品的阶级属性问题。比如对于《行露》，他就只从婚姻诉讼的角度去作解释，不对诗里人物的身份作主观的阶级定性。对于《月出》，他也是从作品本身所表达的内容、情绪出发，把它当成一篇情歌来处理；而不是象有的人从某个字的训诂生发开去，硬把它说成是描写起义英雄的诗。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诗经》的某些篇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北风》，他不同意把它当成情歌来解说，仍采旧说，指出这是“刺虐”的诗。总之，坚持按照作品实际去解说，在还《诗经》篇义的本来面目上作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诗经》研究者们所沿用。

这几部选本都附有“前言”。每一篇前言实际上反映了著者对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观点。例如在《诗经选》的“前言”中，他论述了《诗经》收集成书的过程及《诗经》的主要内容；在《汉魏六朝诗选》的“前言”中，他概括地、系统地论述了八百年间的诗歌发展演变过程，及各时期诗歌的主要特征，不啻是八百年诗歌发展史的纲要。在《三曹诗选》的“前言”中，他分别论述三曹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指出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是现实性、抒发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这几篇“前言”不仅有助于一般文学爱好者理解、把握某一时期的文学运动，而且许多观点很有学术价值。

除了上述个人研究成果外，解放三十多年来他在何其芳等同志的领导下长期主持古代文学研究组，团结了组内一些著名学者，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已故）、孙楷第（已故）、吴世昌（已故）、吴晓铃、力扬（已故）等研究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培养中青年研究者方面，他也作了大量工作。主持了不少集体科研项目。他作为总负责人兼上古至隋段的主持人，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三卷本）。这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出版后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大收获”。他又主持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这部书从1963年即着手编选，并于1966年写成初稿，由于“文革”浩劫，直至1978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选录了唐代诗人130余家的630余篇作品，大体上反映了初、盛、中、晚唐各个时期诗歌的面貌，除突出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外，也选入了一些向来不被选家所重，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特色的作品。本书颇受国内外重视。此外，他还参加了整理校点《乐府诗集》的工作。此点校本以宋本影印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并参校有关各史的乐志、有关作家的本集、类书和诗文总集。

余冠英先生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在他的几部选本中、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及选注的《唐诗选》中、在他关于汉魏六朝诗人的评价中，都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尽管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风云变幻，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严谨、稳妥、平实，因此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想到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有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而立偏激之论、甚至违心之论，这就更见出他治学的诚实和为人的方正。

余冠英先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近六十年，学识精深，年高德劭。他待人诚恳宽厚，在同辈中有“君子”之誉；对于晚辈，则

是一位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长者，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无不
对他“坦荡荡”的襟怀气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年余先生已八十一岁了，尽管身体不太好，深居简出，但
他仍然关心着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前景。他曾在一首诗中
写道：

神州自古焕文章， 李杜之业何煌煌。
蜀山耸翠水沧浪， 此间乃有青莲之馆，
浣花之草堂。
游人到此仰辉光， 古今入望思何长！
盛唐育李杜， 李杜光盛唐。
今人思古不忘祖， 祖望子孙能颀颀。
昔贤往矣史留芳， 后贤继美有新章。
江山佳气无穷尽， 新史会有新盛唐。

这首诗是他前几年应四川省江油县李白纪念馆之请而作的。诗中
洋溢着对灿烂的古老文化的自豪感，对新时期的文化繁荣充满了
信心。而笔者则从诗句中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后人的殷殷期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